



王世杰传

王世杰（1891—1981），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后留学英、法，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到台湾后也历任政界和学界要职。堪称蔡元培以后中国学人从政之第一人。他连续担任重要职务长达60年，经历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很多重大事件，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政治、外交、法律、文博事业、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等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薛毅 著



王世杰传

薛毅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世杰传/薛毅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307-07843-7

I. 王… II. 薛… III. 王世杰(1891 ~ 1981)—传记 IV. K825.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2563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258 千字 插页: 8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843-7/K · 458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民国史上，王世杰无疑是一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一生在教育界、政界、学术界身居高位，先后在大陆和台湾担任过重要职务。在他长达 60 年的职业生涯中，经历并参与了 20 世纪中国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一些活动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政治、外交、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作为民国时期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民国史的认识和了解。

作为一位教育家，王世杰一生与武汉大学有着不解之缘，他临终留下的身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的遗言，以及表示将他珍藏的 77 件名人字画赠与武汉大学（这批书画现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遗嘱，表达了对武汉大学的殷殷之情。

1928 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彻底改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经过湖北省教育厅长刘树杞的一段代理校长之后，1929 年 5 月，王世杰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在办什么样的大学问题上，他提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王世杰在履职的欢迎大会上，提出了创建新武大的五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独立的经费”、“良好的教授”和“严整的纪律”。

在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和校舍的建设中，王世杰校长积极奔走于各方之间，还远赴上海、南京筹措建校经费。经过两年的努力，

武汉大学第一批早期建筑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旁、碧波荡漾的东湖水畔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

在教授的聘用上，王世杰校长极为关注学术成就，不认门户之见，倡行兼容并包。因此具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曾被聘用，并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王世杰校长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的人才盛极一时，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著名学者云集。

在学生的培养上，王世杰校长强调“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

1933年，他升任教育部长，校长由王星拱接任。他在离开武汉大学的讲话中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并对武汉大学寄予厚望：“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来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数百名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须继续努力。”

到台湾后，王世杰校长对武汉大学依旧情深意笃。为寄托对武大的思念，他刻了一方“东湖长”的图章，一一钤在他所收藏的名贵字画。

东湖长，勿相忘。武汉大学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校长，如今王世杰校长的塑像已矗立在美丽的樱园顶上。

王世杰校长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国立武汉大学，在今天已有了全新的气象。在古朴典雅、巍峨壮观的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中，武汉大学法学大楼、经管大楼、外语大楼、计算机大楼等拔地而起，成为学校迈入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学科以其综合性的特点，涵盖了哲、经、法、教育、文、史、理、工、农、医、管理等11大门类；在已有的正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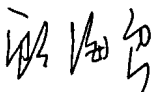
教授 2300 余人之中，名师荟萃，英才云集；人才培养，硕果累累；学科研究，成就卓著；社会服务，效益彰显；文化引领，独树一帜；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武汉大学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明确了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的发展定位，致力于推行“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不断提高学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奋进。

《王世杰传》的作者薛毅教授，长期工作、生活在武汉大学，深受珞珈文化的感染、熏陶，也必然深受王世杰老校长这位武汉大学发展先驱的影响，这也许是薛毅教授写作此书的内在动因。薛毅教授为写好《王世杰传》，尽心尽力地系统地搜集相关资料，曾三次到台湾寻访，比较完整地查阅了王世杰校长的文集、日记、信件和相关档案，多次采访王世杰校长的女儿和其他亲属及知情人，得到了武汉大学台北校友会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大力支持，掌握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在此基础上，薛毅教授对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我相信，《王世杰传》的出版，将有助于读者对 20 世纪中国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王世杰校长更为深入地认识和理解。

是为序。

武汉大学校长



2010 年 4 月 26 日

目 录

第一章 从崇阳到武昌	1
第一节 童年时代	1
第二节 武昌—天津求学	2
第三节 参加辛亥革命	5
第二章 留学英法	9
第一节 留学英国	9
第二节 留学法国	14
第三章 从被聘北大教授到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长	16
第一节 任教北京大学	16
第二节 参与创办中山大学	23
第三节 初入仕途	24
第四章 创办国立武汉大学	27
第一节 选定与规划新校址	28
第二节 募集办学经费	33
第三节 设置学科 延揽师资	34
第四节 重视外语学习	38
第五节 保护学生	39
第六节 与蒋介石的最初交往	39
第七节 跻身一流 享誉中外	42

第五章 民国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教育部长	47
第一节 整顿高等教育	49
第二节 关注蒙藏等边疆教育	55
第三节 担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	56
第四节 经费冲突	57
第五节 建立研究院所与公布《学位授予法》	59
第六节 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	61
第七节 签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	63
第八节 组织大学内迁	66
第六章 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69
第一节 主管军事委员会的外交事务	70
第二节 参事室的地位、成员和工作范围	73
第三节 王世杰参与的外交事务	75
第七章 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主席团主席	86
第一节 筹建国民参政会	88
第二节 率团访问英国	91
第八章 两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	95
第一节 首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95
第二节 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96
第三节 担任中央党政训练班总教育及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97
第四节 担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97
第九章 参与国共谈判	99
第一节 西安初步谈判	101
第二节 重庆继续谈判	107
第三节 担任重庆谈判首席代表	116

第四节 参与国共停战谈判·····	123
第十章 担任外交部长·····	128
第一节 非常时期担任外交部长·····	129
第二节 交涉对日本和约·····	138
第三节 参加五国外长会议·····	142
第四节 参加联合国·····	145
第五节 取消领事裁判权及外国人在华各种特权·····	146
第六节 战后中法越南问题交涉·····	148
第七节 处理张莘夫事件·····	151
第八节 参加巴黎和会·····	153
第九节 与多国签约与换文·····	154
第十一章 出席 1946 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	160
第十二章 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	166
第一节 特任“总统府”秘书长 ·····	166
第二节 被解除“总统府”秘书长职务 ·····	167
第十三章 主政“中央研究院” ·····	171
第一节 担任第四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	171
第二节 推动台湾科学发展·····	181
第十四章 晚年岁月·····	184
第一节 情系武汉大学·····	184
第二节 醉心书画艺术·····	189
第三节 九十大寿·····	198
第四节 备极哀荣·····	203
第十五章 王世杰的家庭与生活·····	217

第一节 家庭成员·····	217
第二节 生活特点·····	220
王世杰生平大事年表·····	223
王世杰著述目录·····	262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79

第一章 从崇阳到武昌

第一节 童年时代

1891年3月10日，王世杰出生在湖北省崇阳县白霓桥镇回头岭村一个农民家庭。

崇阳县位于湖北省南陲，幕阜山脉中段北麓，隽水河中游。东临湖北通山县，南接江西修水县，西连湖北通城县和湖南临湘县，北濒湖北的赤壁市和咸宁市。崇阳境内多山，峰峦叠嶂，俗称“八山半水分半田”。由于山地较多，该县人口相对较少，是湖北省人口较疏的县份之一。

王世杰的祖上约在明清之际自江西迁至湖南浏阳，再从浏阳辗转移民到湖北蒲圻（今赤壁市），其中一支再迁至崇阳县，定居在县城东南乡白霓桥附近。据崇阳县回头岭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的《王氏族谱》一书记载：

崇邑之回头岭庄，恭元公，号昌台，由蒲圻之神山徙居于此，今已十传矣。徙居之年间，则无可考，兹稽谱乘，恭元公生于清康熙壬寅年，稽清史，高宗纯皇帝乾隆元年丙辰，在位六十年。恭元公之长子自坤公生于癸亥年，应生于乾隆八年。以此理推，恭元公徙居崇邑之回头岭，应自清乾隆始。

据《王氏族谱》记载，恭元公生有三子。长子名坤公，字韶山，育有二子。长子名信禄，次子名信裕。信禄只生育一子，号晋亭。“至王晋亭有子5人，其中2人登科第，3人从商。行三者名

为干，字步瀛，即王世杰的父亲，于兄弟析产后主持家政，兼事商业，因乐善好施，为乡里所敬服。”^①关于王世杰的父亲，《崇阳县志》的记载是：“父步瀛，经商业屠，富甲乡里。”^②

王步瀛的原配甘氏为邻村名门望族之女。嫁到王家育有一子，取名寿祥，不久即早逝。续弦仍来自甘族，婚后生育七子二女，王世杰在七兄弟中排行第五，二女均为他的姐姐。王世杰初名燮廷，字雪艇。

5岁时，王世杰进入父亲为族人所建的塾中读书。这一时期，由于他敏而好学，善于思考，深得业师周昌甲（子西）赞赏，“许为奇才”。虽然他在“诸生中年龄最幼，而每试辄冠其侪”^③。9岁已能读时务文字。小时候，由于家里孩子太多，家务繁重，母亲无暇照管他，往往由两个姐姐照顾他。每逢过年，总是由姐姐带他去看野台戏。

1903年，母亲安排家里的会计先生陪他到省城应童子试。途经咸宁一商号时，店里老板见他小小年纪就去应考，出于好奇出对子考他。老板出上联：“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杰随口对答：“老大人四季发财”^④，众人皆称奇。

第二节 武昌—天津求学

王世杰的少年时代，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入大变动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恰是张之洞督鄂并在湖北大力提倡新学之时。

在晚清官员中，张之洞是一位兼具学者特色的官吏。他一生所探究和推行的，大部分都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尽管他是一位与时

①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怀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长》（下），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页。

② 《崇阳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

③ 王麟书等主编：《王氏族谱》，1993年12月版，第20页。

④ 张昌华：《王世杰二三事》，载《人物》2006年第12期，第55页。

俱进的人物，甚至有明显的超前意识，但对他的思想起决定作用的是实用主义和儒家正统两个因素。“实用主义以功效为价值判断标准，而‘正统主义’则以三纲五常为判断行为的准绳。前者求变，后者守常，因此，这两个思想元素之间，基本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在张之洞看来，他们是以道统为主，实用为辅的统一体。”^①在中法战争之前，张之洞的教育主张是以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上层通才为目的。他所理想的人才标准是：知识上博古通今；品德上孝悌忠信，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政治思想上尊君爱国；学术态度上崇敬古今圣贤学者。中法战争后，他认识到传统的教育制度不能发挥救国的功能，必须进行改革。于是，他开始试办洋务，倡导西学，大量引进西方的学问，改革并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学制。为传统教育经世致用的功能赋予了新意。

张之洞在湖北先后开办了汉阳枪炮厂、制铁局、湖北织布局、马鞍山煤矿等，急需培养人才，所以他极力主张兴办新式学堂。在张之洞的推动下，湖北省于1902年5月成立了学务处，开始兴建新型高等小学堂。当时湖北省城有新式学堂5所，即东、西、南、北、中五路每路各设一所。这些学校招收的学生年龄一般在11—14岁，学制4年，要求入学者能背诵1~2部经书。王世杰顺利通过考试，进入在原来武昌工艺学堂校址上新建立的南路高等小学堂。为了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母亲安排家里的会计先生随他一同住在学校附近。会计先生白天在校门口摆一个花生摊，其余时间照顾王世杰的生活。

离开家乡时，王世杰的大姐很认真地叮嘱他：“你到了武昌，人家问你家住在那里，你可是不能说回头岭、白霓桥，那样人家就会知道你是乡下人，会瞧不起你的！你要告诉人家，我家住在状元岭、凤凰桥。”^②

^①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5），1983年版，第13页。

^② 王秋华：《忆家父》，载王麟书等主编：《崇阳回头岭庄王氏宗族续编》，第39页。

来到省城读书，王世杰处处感到新奇和兴奋，学习兴趣倍增。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修身、读经、中文、算术、历史、地理、格物（自然科学）、绘画、体操等。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曾得到两广学政梁鼎芬的称赞。张之洞听说后特意召见了，问他有何志向。王世杰答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避之，不去也。”张之洞闻之十分满意，随即赐他为举人。在王世杰家乡的老宅上有块“五经魁”的横匾，署名“王世杰立”，即由此而来。

1907年，王世杰从南路高等小学堂毕业，随即考入由原来两湖书院改办的湖北省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分在理化科。当年11月王世杰入学后，先后学习的课程有伦理学、中国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图画、物理、化学、数学、地理、日文、体操等。他于1910年毕业，总平均成绩为84.91分，在全堂54名同学中名列第4。同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

1910年秋，王世杰只身一人来到位于海河之滨的天津，求学于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

北洋大学的前身是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创办于1895年；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在清朝末年，辽宁、直隶（今河北）、山东等沿海各省称为北洋；南方沿海各省称为南洋。北洋的中心在天津。天津当时是首都北京的门户、北方水陆交通的枢纽、重要的工商业和港口城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北洋西学学堂自创办之始，就以美国著名的大学为模式，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该校在学门设置、学门方向、学制、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授课内容、方法与进度、教员和教科书的选用，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参照。该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北洋大学创办初期，分设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学门。矿务门后改为采矿冶金科。北洋大学自创办起，“即以严谨治学而著称，在严谨治学上主要是抓住两项至关紧要的工作：一是严

格延聘教师；一是严格挑取学生”^①。该校的升级考试十分严格，学生一门主课不及格就要留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淘汰率高达50%~60%。

王世杰就读的是采矿冶金科。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后来较著名的“有奉天矿务局总办王正黼，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直隶省代表、开滦矿务局顾问娄鲁青，大冶铁矿经理、汉冶萍煤铁厂厂长王宠佑等”^②。

第三节 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是辛亥年。这一年，一场迅速席卷古老中华的革命狂飙由湖北突起。湖北革命党人以高度的革命主动性，敢为天下先，抓住革命的机缘，使辛亥年成为革命年，使武昌成为这场革命的首义之区。武昌起义从10月10日晚上开始发动，经过一夜激战，至11日黎明，武昌全城即被起义军占领。11日下午，革命党人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了军政府的第一份文告。其内容如下：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军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日满奴，并非我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众戮力驱驰。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息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急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必定同驱蛮夷。军

^①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②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行素有纪律，一体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人人敬听我词。^①

10月12日，革命党人又以黎元洪或军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全国文》、《黎都督布告海内人士电》等文告，在全国各界人士中迅速产生震撼性的影响。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王世杰闻此讯后当即决定投笔从戎，离开天津来到炮火连天的武昌。

当王世杰来到武昌时，正值革命军和清军战事正酣之际。最初他担任鄂省督军府秘书，后因战斗激烈，他随即“参加守城工作，继由都督府派为代表赴湘请师，湖南都督谭延闿即派在湘之桂军赵恒惕一旅，与世杰同乘招商局轮返鄂，驰援武昌，城危得解”^②。

1969年1月8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从近代史所借出关于辛亥革命著述多种（内有数种系中共出版）细阅，甚觉辛亥革命获得武昌藩库银两及湖北当时地方发行机关（湖北官钱局）之官票为数甚大，有助于革命政府之成功不浅。^③

关于辛亥革命，王世杰在晚年曾撰写一篇题为《辛亥首义成功的主要原因》的回忆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辛亥首义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为民气之高昂。满清内政之腐败，外患之严重，经国父及同盟会同人与其他志士之呼吁，已造成全国政治革命之思想与要求，此为成功之第一个主因。

二为湖北新军之发动。8月19日之发难，参加者虽为各

①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16日载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陶英惠：《王世杰》，《珞珈》第112期，1992年7月版，第2页。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8册。



武昌首义青年王世杰

青年时期的王世杰（1912年摄于武昌）

方之文武同志，而湖北新军实为主力。新军士兵极多青年学子，富于政治革命思想，对此次发难之功为独多，曾未假手会党或旧日绿营军队。故发难之后秩序井然，实为前此若干次革命发难时所缺乏之军事条件。

三为汉口外国领事团之迅速承认。在发难前，一般人不免有革命可导致瓜分之虞，然武昌首义，纪律严明，革命党极力运用对外之联系，汉口领事团遂于发难后数日一致认武昌革命政府为交战团体，此于振奋人心，功效甚巨。

四为革命地区之财政坚强。武昌有官钱局、造币厂及藩库等巨额存款，故自发难以迄南北议和，从无财政恐慌。益以革命政府自律之严，政府中人一律不受超过20元之生活费，财政乃更宽裕。

有此人心、军事、外交、财政四大因，首义之举，乃能给予其他地区以充分响应之时机。从知首义之成功，决非幸致。

然除以上四因之外，尤以国父思想的严正与人格的伟大，为最有影响力量的因素。国父的思想不独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中为最彻底的主张，即在当时议论纷歧，世界中心为最严正的理论。兹不具论，至于国父人格的伟大，余所最觉评断精湛者为